

第一代领导集体勾画中国经济蓝图

- ☆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制定
- ☆陈毅说：希望全党抽调干部帮一把
- ☆接收城市和没收官僚资本
- ☆土改使我国广大农村获得新生
- ☆毛泽东正式提出：要慎重对待富农
- ☆中央决策要坚决废除地主所有制

(一)

蓝图初构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顿时，广场上彩旗飞舞，30万集会群众欢声雷动。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沉睡百年的巨人苏醒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再用

一段时间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为这幅蓝图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中就已经预言：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 新中国是我们的。”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力量还很弱小，外有强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摩擦”。可是，在黄土高原上身居土窑洞、吃着小米饭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却高瞻远瞩 满怀胜利的信心 用诗一般的语言 向人民发出了迎接新中国的呼唤。

早在 1922 年召开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我党就制定了自己的奋斗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即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 消除内乱 打倒军阀 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根据这一纲领，毛泽东在 1939 年冬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和 1940 年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中指出，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当时已经指出了新中国即将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在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发展中，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社会主义因素，即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也在发展，加上国际环境的有利，新中国经济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空前发展壮大，终于迎来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的曙光。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毛泽东以敏锐的政治家的眼光，看出了这一事态发展的非凡意义。10月8日，他起草的给山东兵团的电报中说：“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显然，这是革命战争走向全面胜利的转折点。

为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开始筹划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10月10日，他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双十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提出了“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 救济灾民贫民 和 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等八项基本政策。1947年底，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双十宣言》的基础上，又归结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

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这一纲领较之于以前的纲领，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这项新内容的提出，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特殊意义的。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是在 1927 年后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利用政治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逐渐积聚形成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它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纲领时，对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在抗日战争中，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提出这一政策的历史条件也不成熟。而在官僚垄断资本已集中了价值达 100 亿至 200 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以后，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已经十分明确。同时，在国共双方的统一战线已经为大规模内战所取代，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提出没收官僚垄断资本的政策，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这一新内容的意义，毛泽东在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2 月期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由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全国经济中居于垄断地位，一旦将其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就能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还对新中国经济的构成作了初步的分析，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在初步分析经济构成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对新中国经济成分的分析，事关重大，它实际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也是我党制定对各种经济成分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具体依据。虽然毛泽东对此已有初步分析，但并未因此妨碍党内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索。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会议“九月会议”。这次会议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特别是对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基本经济政策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发言体现了毛泽东关于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思想。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将由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四种形态构成；民主革命阶段结束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还说，必须严格地说一句，在中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对将来新中国建立后，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作了一个估计。他在插话中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他认为：“在经济上完成

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会议认为，提出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研究，对于避免在新情况下、新问题上又糊涂起来犯“左”或右的错误是十分必要的和有益的。对于经济性质的分析，毛泽东很慎重，在会议结论中说，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请刘少奇继续考虑，并草拟文件，以待七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讨论用。

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于 9 月 15 日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报告送给中央。东北局于 8 月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会后，他以第三部分《我们在城市中的阶级路线》为基础，根据大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写成提纲，交东北局讨论通过并报中央。当时，东北解放区内有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城市工作的实际经验比其他解放区要多。这个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报告中的这一论述，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强调了几点：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范围内，不能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

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随后，刘少奇对提纲作了精心的修改。

10月26日，毛泽东看过刘少奇的修改稿后，赞扬他修改得很好，并提议由中央批准这个提纲，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对提纲中“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毛泽东提出要改为“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他指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轨道之内。

这样，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这个分析就肯定了下来。毛泽东在1949年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经建方针，9月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今后对经济构成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路线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东北那个文件基本上对的，与9月讨论的相符。

蓝图细化

这些基本方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更加完备的表述得到通过。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这时，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全国胜利近在眼前。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前夜召开的这次会议，需要解决新中国面临的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全会期间，共举行了八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在 3 月 5 日下午开始，由毛泽东作重要报告，讲了 10 个问题。此后，每天拿出半天来开大会，由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负责人汇报工作，围绕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讨论。13 日大会闭幕，由毛泽东作总结发言，简要评价各地工作，对个别问题作补充说明，并系统地讲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他说，要以二中全会分个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进入城市，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进入城市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二中全会就是“城市工作会议”，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方法。在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于这一点讨论得十分热烈。邓子恢的发言有很大的代表性。他说，今后工作中心转入城市，进城后依靠工人阶级，抓紧恢复与发展生产，毛主席把这两个问题明确肯定地提出来非常必要。进城后依靠谁，思想上模模糊糊。郑州、开封首先抓贫民及苦力工人，忘了产业工人，这是普遍现象，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明确。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生产，这一点我以前就不了解，以为要在发动工人之后，才搞生产；不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你怎样搞工人运动呢？

搞城市工作，要有干部准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把军队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党中央当时确定由陈毅负责将来接收上海。陈毅明明白白地说，最头痛的就是接收，二十几个部门要配干练的干部，还要懂高技术，“希望全党抽调干部帮一把”，“希望中央如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齐心协力。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除提出在全国胜

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以外，还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当时，中国已经有 10% 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还有 90% 左右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这个基本国情，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对几种不同性质经济成分的政策。他说：“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

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根据以上政策，在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经济成分的构成情况是 国营经济 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合作社经济 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它将催生新型的人民民主国家。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起，各民主党派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1949年6月11日，各界代表人物经反复协商，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筹备会预备会议，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开始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起草相当于共和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提交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在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中，讨论得最激烈的莫过于未来共和国的经济问题，经过反复协商后，才取得一致。

毛泽东是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席，周恩来是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筹备会第三组组长。起草共同纲领，是各组工作中最繁重的，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全文，经毛泽东审阅后，才提交小组讨论。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来北平后，暂驻香山。负责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周恩来工作异常繁忙，遇到问题时要及时到香山向毛泽东报告，又要到民主人士暂住的六国饭店、北京饭店等处找他

们交谈磋商，奔波往返，十分辛苦。毛泽东在考虑新政协共同纲领时也十分注意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的主要代表面谈，交换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见。为了工作的方便，毛泽东于 6 月 15 日从香山搬进城内，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居住和工作。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大量工作 历时三个月 新政协的《共同纲领》终于制定完成。

在新政协的开幕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和事项后，于 9 月 30 日闭幕。《共同纲领》指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与此相适应，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根据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共同纲领》确定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 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济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

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体现了自 40 年代初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纲领。这可以从其中关于土地改革、工商业政策等一系列规定中反映出来。

关于土地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关于国营经济，《共同纲领》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共同纲领》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根据新民主主义国家人民政权的性质，《共同纲领》还具体规定了新中国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对工商业、计划、金融、交通、农业等的政策。

例如：

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

订立集体合同。私营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关于农林渔牧业：在一切已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

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关于交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

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的管

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人民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办法，鼓励人民储蓄，便利侨汇，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

关于金融：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营。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

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周恩来于 1949 年 9 月 22 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他在介绍《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部分时说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筹备期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讨论最多。各方面好的意见都已经集中在草案的条文里面。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轻重缓急之分。草案中已根据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现在可以做的、哪些是现在不能做的；哪些是已经做了的、哪些是尚未做的等分别规定出具体的条文。

在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没有明确写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容。这一点，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很多的猜测，认为当时为了求得妥协，我们可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

其实，对这个问题当时已经有了说明。周恩来作的关于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中指出：总纲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发展前途写出来，是因为考虑到：“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

当时不提社会主义，还有一层考虑，这就是因为政协还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如果在《共同纲领》中提出来，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就会乱了阵脚，不利于发挥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共同纲领》才没有提社会主义。毛泽东也说过，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纲领和方针的确定，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领导人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据《共同纲领》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长征。

一百多年前，拿破仑曾经指着地球仪上标明中国的地方说：那是一头沉睡的狮子，让它继续沉睡吧。一旦醒来，它将震惊世界。拿破仑不知道中国人自认为是龙的传人，这条巨龙确实沉睡了多年。而今，巨龙醒来了，它将奋起，并将傲然屹立于世界

的东方！

(二)

妥善接收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起步，是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的。而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是旧中国留下来的、历经连年战火破坏的现代工商业和农业。将它们继承下来并加以改造，使其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服务，这一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民主主义纲领确立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

在战争中，旧中国原有的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现代工商业基础，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军队在败逃时，往往蓄意炸毁工矿企业和基础设施；而人民军队在力量尚不足以长期占领城市和工矿企业时，有时也不得不将一些设施破坏，以免为敌人所用。

占旧中国经济 10% 的现代性的工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国革命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抗战”胜利以后，人民武装占领了一些中小城市，但仍然处于敌我拉锯之中。为换取战略上的机动权，往往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因此难作长久之计。但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一些为人民武装所攻克的城市，有了长期坚持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再采取游击战争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实际。必须有意识地保护好已有的现代工商业，尽可能完整地将其接收下来，为我所用。

长期处在农村环境之中，使人民军队中部分干部和战士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